

抵

抗

投

张承志 卷

降

书

系

无援的思想

张承志 ● 《心灵史》

WUYUANDESIXIANG

主编 萧夏林

华艺出版社

抵抗投降书系

张承志卷

无援的思想

主编 萧夏林



一九九五年四月·北京

(京) 新登字 124 号

书 名: 无援的思想
编著者: 萧夏林
出 版: 华艺出版社
发 行: (北京朝内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话 675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河北兴隆县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书 号: ISBN7—80039—917—6/I·506
定 价: 12.80 元

(书中如有缺页, 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时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写在《抵抗投降书系》的前面

90年代初,在我们需要文化英雄文学斗士、需要良知集体承担苦难构筑精神长城的时刻,我们看到了王朔发动的一次“痞子革命”,这场在民族精神危难中诞生的革命,出人意料地未受到文坛的抵抗,反而获得热烈欢呼。在这种呼唤声中,王朔愉快地进入文坛中心,成为文坛新楷模。于是,中国作家纷纷加入“痞子革命”中,投靠王朔,掀起了一场风靡文坛弥漫全国的“痞子运动”。

很显然,这场“痞子运动”是在痞子革命中迅速痞子化流氓化的作家无耻地领导了全民痞子化的一场运动,应该说它是文革词语又一次曲线的“辉煌”表现,它不仅使几千年的汉语言及她的文学的高贵与尊严再一次蒙受耻辱遭受劫难,而且瓦解了十年改革的精神成果,导致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又一次沉重衰退和死亡危机。这无疑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一个噩梦。

痞子运动标志着当代中国作家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绝大部分作家从此彻底放弃了对“现代”的承诺和信仰,背叛自己80年代的理想和热情,公开地媚俗向大众投降,大张旗鼓地倡导“怎么都行”的后现代。他们把王朔当作时代的英雄,自救的楷模。这标志着中国作家进入放弃救世,进行所谓自救自娱的新时代,也就是放弃良知赤裸裸地以耻为荣的时代。

于是,我们看到,理想信仰艺术和良知不再是中国作家心灵的依仗,金钱的欲望犬儒的幸福成为中国作家们的快乐追求,消解崇高躲避崇高遗忘崇高成为中国作家争先恐后献身的伟大时尚。作家们放弃严肃和真诚泯灭对苦难和正义的关怀冲出道德和良知的长城,彻底放纵自己,解放自己,沉醉在堕落的自由中。他们已完全不靠心灵写作,只靠玩故事玩词语和玩技术,进行一种油头滑面的文字游戏。写作的目的完全是一种商业化的金钱主义,一种中产阶

级的享乐和梦想。因此，他们就退化成一种码字工成为汉字的市场批发商。于是，我们就看到媚俗投降背叛的痞子文学、性乱文学、闲适文学、帮闲文学、喷嚏文学等文学垃圾，在中国的报刊杂志和大街小巷的空前繁荣。

虽然媚俗背叛成为中国文坛的主潮，控制了市场的巨大空间。虽然，理想派作家的阵营里，已所剩无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丧失信心，接受失败，甘愿被投降的声浪淹没或被淘汰出局。所以，在媚俗和背叛的洪流中，我们仍然能看到拼死反抗的作家，仍然看到理想的圣战者，看到道德的坚决捍卫者，他们依然在信仰中坚守，在崇高中运笔，在苦难中呼喊。仍然以坚持真理和正义为荣。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投降都不放弃都不背叛。

所以，当他们对文坛失望和绝望时，他们就会英勇出征，当他们呐喊以笔为旗进行战斗时，这个时代就会为之变色，就会诞生大的激动人心的风景。

鲁迅先生说，中国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鲁迅先生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华民族正是有了这些脊梁的悲壮和辉煌，才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奔流不息，泱泱至今，才没有被纷纷扑来的大苦难大悲剧大痛苦所窒息所击倒。

今天中国的脊梁们仍然如此。

在民族精神危机时刻，他们在失望与绝望之中又是慨然而出，表达自己抵抗的伟力战斗的坚韧与执著。

于是，我们看到了，张承志、张炜、韩少功、余秋雨、李锐、史铁生等当代文学英雄，民族良知抵抗的身影。看到了他们忍无可忍的出发，看到他们走出思想和艺术的象牙塔，来到文坛和时代的前沿，举起“抗战文学”的大旗，直面文坛和时代的黑暗，用匕首投枪，抨击文坛的背叛和堕落，呼唤正义和真理，理想和信仰，呼唤苦难的文学，血和泪的文学。

于是，我们看到了坚持理想正义的抗战文学大旗猎猎飘扬，看到了抗战文学抗击媚俗反对投降悲壮雄伟大气磅礴的风景。

张承志,这位拼命硬干的理想主义幽灵。以“虽千万人我往矣”的英雄气概独步天下,在荒芜的英雄路上,慷慨悲歌。他用生命巨笔,血写《心灵史》这部英雄和信仰的史诗,举念信仰的神圣,反抗的无畏。在以耻为荣后现代的喧嚣中,在后庭花的大合唱中,以笔为旗,直戳文坛的黑暗,直捣当代文人的卑鄙,倡扬“抗战文学”,呼唤清洁的精神,呼唤高贵自尊的文学,他的一篇篇抗战美文巨大地震撼了这个滞闷的时代。

张炜,这位埋头苦干的山东硬汉,这位沉浸于大地苦难的理想主义分子,在《古船》的悲怆之后,又推出《九月寓言》、《柏慧》这象征着作家艺术信仰和反抗信仰的长篇杰作,以对抗这个媚俗投降的时代。他的散文与随笔更是作家咀嚼苦难,坚持理想和信仰的抗战记录。张炜,站在大地梦想的中央,以不宽容、不容忍、不退却、不背叛、不投降、仇恨和永远战斗,回答了痛苦时代于诗人何为的巨大质问。

韩少功,这位新时期文学的风流人物,在90年代的物欲洪流中,毅然退守人文沉重的主体和民族心灵的劫难中,举笔沉痛夜行。他顶礼人文的精魂,反击精神的叛卖与无耻,阻击物欲对精神心灵的暴政,揭示极端金钱主义与极端政治专制主义高度一致的现实,揭露中国“后现代”“怎么都行”的卑劣无耻。韩少功,站在人类的高度,面对物欲横流的中国,重说人的渴念与存在,重缅人的灵性与永恒,再悼失败文明的尊严。他显然是在作人类终极追问和民族至尊意义上的大思考,更是对今天这个时代的一种高瞻远瞩的警示。

余秋雨,这位执著的文化苦旅,从今天出发,沉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跋涉入中国文人坦途与坎坷、希望与绝望、滚滚痴情与滔滔蒙昧的心灵史之中。品味他们不尽的光荣和悲痛辉煌和辛酸,凝视他们在历史的黑夜中永远哀伤的眼睛,拾掇他们在几千年的野蛮与苦难中永远钟情又不断破碎的人文精魂。余秋雨把五千年中国文人灵魂痛苦的碎片,奉献给这个精神支离破碎人文理想解体的欢乐时代,表达了作家的良苦用心。

史铁生这位地坛的圣子，并没有被“后北京”所化，成为地坛上“后现代”的歌手。他依然在地坛上弹奏人类悲悯的生命之琴。

李锐，这位太行山下厚土中耕作诗意谛听天籁的作家，以自己清冽的性情，别异的韵致，抒写自己拒绝合唱的文学悲歌。

在当今文坛上的一些风流人物看来，他们的激烈的社会道德批判，悲壮的理想主义，沉痛的民族使命感显然是不合时宜。显然是这个市场时代的异端，是陈旧历史古典情韵的守墓人，是时代的落伍者。虽然他们是极少数，但他们却忠于正义真理和人民，浩然正气充满天地间，代表着人类精神的指向，代表了民族文化的希望。他们显然是大者勇者，卓越的特立独行者，屈原鲁迅的承继者，是真的猛士，是这个时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他们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和希望，是这个悲剧时代最悲壮的精神财富。

在这个可诅咒的时代，正是由于他们的悲壮存在，正是由于他们的敢哭敢歌敢悲敢骂敢打的抗战文学，才英勇抗击了媚俗投降的大潮对所有人的侵袭，才使得那些渴望精神的人们在精神寒夜里看到心灵的灯火，得到精神的牵引。使理想主义者受到鼓舞，获得信心和勇气。而且，正是由于他们的悲壮存在，今天的中国文学史，才没有成为一条肮脏的河流。几千年伫立中国苦难中希望中的脊梁悲歌才没有在今天停息。我想，这就是中华文化不朽的血脉，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不死的伟大证词。

抗战文学，是对中国文坛堕落的严厉警告，也是对整个沉沦时代的警告。这警告，展示了抗战文学，高蹈理想和信仰，坚守道德和良知，抵抗媚俗和投降的信心和决心。

虽然在今天，媚俗与投降的潮流仍然在继续，但这些理想主义作家这些抗战大家们的抗战文学已越来越显示出其理想的魅力和正义的魅力，其英勇顽强抗击这个时代的背叛和堕落的英雄之姿，且正在获得人民的巨大喝彩。媚俗投降的文学显然在遭受大众的抵抗而正在成为历史的陈迹。虽然他们仍然快意于堕落的疯狂中，但中国毕竟是产生了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的伟大国度，在广大贫苦人民占绝大多数的当代中国，而且物质和精神都急需现代

救援的严峻时代，她不可能再接受和容忍中国文人那种兴灾乐祸自私自利蒙蔽人民的中产阶级媚态，她不可能也不会允许痞子文学帮闲文学等媚俗投降的后现代文学长期横行，而且媚俗背叛的文学也不可能在中国长盛不衰，他们的衰败可以说正在到来。垃圾总要被清除，痞子流氓无赖汉奸总要被人民驱除出文坛的正堂。

到了今天，中国理想派作家显然更加坚实更加成熟，也更加自信，而且有了一种从容不迫的大家风范。他们也痛苦，他们也绝望，但他们绝不颓废，他们在反抗和战斗中能够超越痛苦和绝望，并在其中前进和生腾。他们及他们的抗战文学的成长和发展，标志着中国文坛理想主义的反弹和复归，更标志着这批理想派作家由文坛的边缘，重返文坛的中心。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是历史的庄严。

本世纪经历了太多大动荡大灾难大悲痛大疯狂大迷茫的中华民族再一次沉痛地把她的敬意给予她悲壮的脊梁们。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悲观绝望，只是我们任重而道远。

萧夏林

1995年3月3日

上 编

无援的思想

——关怀《心灵史》的散文随笔

我们需要抗战文学

1

以笔为旗

几乎让人信以为真的大热闹突兀地收场了。八年前或更早就被同道们欢呼的新时期不仅旧了且已进了古董铺了。肉麻地欢呼黄金时代的人，庄严地总结新时期的人，“东施”抹上魔幻口红，正和“西施”一起以色售文。几十年纠缠在稿纸卷头却意在高官流水帐的人，因不逞和无才而小心翼翼但求人和的人，高喊冲锋可是不见流血的人以及种种这棵树上附庸寄生的人——都在几个月里蜕壳现形，一下子遛了个空荡荡。所谓三青过后诸芳尽，各自需寻各自门。不过一古脑儿都涌向了商人门了。白居易曾用“老大嫁做商人妇”来感慨艺术生命的夭劫，今日大概只是他价值观念陈旧的暴露了。未见炮响，麻雀四散，文学界的乌合之众不见了。占据着这儿的已是视此地为商场的股民——他们进场就宣布过没钱就撤，毫不遮羞，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包括文学的一个进步。

不知资历深厚的老者们如何回忆。我虽然仅仅执笔十年左右，回忆着却不禁倒抽凉气。幸亏，在心理上和行动上我并没有与他们依存：我远远不曾预言，但我多少有过预感。

在预感到他们——酸点说，并不爱文学的日子里，我朦胧地有一些估计，这就是：文学在相当程度上还是空白多的领域，中国有十二亿人和几千年文化，会有爱文学的人逐渐与这领域结缘。我自己该判断的，只是自己的经历、资质和能力而已。大热闹的收场，大混乱的世相，隐蔽着文学者进入文学天地的动静。到了彼时，无论是与他们结伴或是与他们竞争，都决非一桩易事。如果上一个浪头没有把人们赶向这本质的问题，下一个浪头是一定要逼人们面对它的。人不一定需要文学，但是有少数人一定需要文学，这里有严峻的被选择，更有自由的选择。

我终于明白了：选择之际，人必须两脚落在一片大陆上。我懂得了为什么在异国我能制造胜仗甚至是险恶地打胜，却一直无法选择的原因。

狭隘的、右翼的、冷酷的民族主义泛滥全球。在异国的两脚连一块稳定的土都踩不住，何况做深刻的选择呢？我先迈回脚，踩住了大陆。

而此刻我敢宣布，敢应战和更坚决地挑战，敢竖立起我的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作中国文学的旗。

我没有兴趣为解释文学的字典加词条。用不着论来论去关于文学的多样性、通俗性、先锋性、善性及恶性、哲理性和裤裆性。我只是一个富饶文化的儿子，我不愿无视文化的低潮和堕落。我只是一个流行时代的异端，我不爱随波逐流。

哪怕他们炮制一亿种文学，我也只相信这种文学的意味。这种文学并不叫什么纯文学或严肃文学或精英现代派，也不叫阳春白雪。它具有的不是消遣性、玩性、审美性或艺术性——它具有的是信仰。

船从空中落向了岸。看见大陆的迷茫轮廓时，心里的感受真无法形容。海岸线向远处的天边勾画而去，山峦静静地起伏而来。严肃的是：这不是一片信仰的大陆。自从两三千年前孔子先生和阴阳先生分别奠基，把儒学和风水分别变成在朝与在野的统治思想体系以来——这片大陆便不太尊重崇敬价值。无论审美价值怎样一度度时髦，思想的关山从来难以逾越。

然而凝视着大陆时，心里的感动更真实。真是千金难买，真是值得一死。我觉得自己已经变得非常彻底：只要出城三里，便陶醉于视野里的音乐之中。真好，大陆像一首无休无止的、川流不息的音乐，我注视着它，全身全心都在共振共鸣。这决不是轻薄为文的同行们可能遭逢的感受。这既然真的仅我一人才拥有，那么就让我把道路走到尽头吧。如此之道是天命，如信者认知的主命。人并非能够轻易遭逢这一切，不要再奢求朋友们为自己挺身前阵，让脚踏上大陆的泥泞吧。

从黄河冲积扇，从黄海之滨的淤田原野，直至秘境帕米尔那墙一般的高原，是你我最大的立足场，也是你我最可信赖的朋友。再多走几步，再用些力气，走向这神圣的旅途吧。应该知道，背后跟上

的人越来越多了。

旗帜不追求成为石头砌造的墓碑。我总在想,旗帜的本质是飘扬过。不管飘扬得高不高,人们看见没看见,飘扬之后留下了什么——旗的追求是猎猎飘扬,激烈地抖着风、美丽地飘扬。

(《十月》1993年第3期)

2

撕名片的方法

接触名片一物,是从1980年初次出国开始的,在国内看见社会上流行名片,大约是在80年代后半。不用说,流入的名片非常多。因为我曾经见过一个老人帮助儿子整理名片,边整理边感慨:这是财富啊——因此我也确实曾经信以为真,多少年来无论怎样处置垃圾,总是收藏着那巨量的名片。后来,实在是不胜其负担了,我淘汰了一批。再过了些时间,又淘汰了一批。至此次回国之前,我注意到自己对名片的行为仅仅是“淘汰”,扔掉了一批一批自认为不再有缘的人的地址,扔掉了一批又一批实在想不起来他们是谁的名片;但重要的是留下了记着的、重视的另一部分。这种做法,在哲学上可能是一种“希望”,在人学上可能是一种恐惧——人收存名片,也许基于一种求助的心理。独自的人总有一份软弱,总觉得有那么多经过满面春风,经过相见有缘,经过相当长的交往和合作而认识的人存在,自己会在为难时获得支撑。淘汰中的心理更微妙;准确性是变移的,潜在的主导因素是对缘份的判断,以及对自己力量的判断。已经无法回忆我是否淘汰掉了真正的朋友,从而也真地失去了哪些朋友了。然而大致上说来,淘汰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准确性;因为多少年来事实证明:真正的朋友大多不印名片,比如甘肃宁夏的回族农民们。反之,世界上用名片的多是老外,而他们连名片上往往也只有一个假名字——北美老外惯于起一个中国汉名,那仅仅是便于他们在中国活动的一个符号,这种“李亚模”

“魏颂华”之类印象会欺骗你，你很难凭这种印象在他或她的老家找到本人。

这些都只是一般的、没有什么意思的知识。

有意思的，充满快感的体验，是撕名片。大撕特撕，一纸簌一纸簌地扔，撕光扔净，把自己与他们之间残存的瓜葛连同自己软弱的希望一阵快刀斩乱麻消灭干净，是人生一大快事。这个愉快的体验，是在我 1992 年秋离开国际世界返回动荡的中国前夕，突然之间实现的。

撕名片的方法之首要原则，是不要对不义的世界再存任何一丝幻想。

应该承认自己的幻想，以及求冀于人的念头太多。世界像一个顺坡往下滑的球，这个坡就是体制。坐在这个球上的人类中，很少有骨血中反抗体制的、不顾生存求完美的人。除了底层；但底层民众不印名片。你身不在底层又心在底层，那么就不应该向体制奢求——这道理浅显极了，但弄清楚它，却需要一场痛苦的磨难。

1989 年冬，我由于这种幻想、软弱和奢求，开始了两年之长的流浪。由于那个欺骗人的希望，人站到了忍受和规避的刃口上，站到了孤注一掷或者委屈求活的选择的矛盾中。

两年，没有比这更长的两年了。人能有机会处于一种逆旅时，才可能靠近艺术。伪的艺术（不用说文学这种技能性很差的粗糙艺术）只有在艰难和困境中，才会从艺术的壳部剥落。残存下来的人因为不甘于屈服，尝到的滋味会很辣，但他们在考验中开始一步步向艺术家靠拢了。

这时你是孤立无援的。首先离开你的，是那些企图寄生于你的人们。他们挖空心思，费尽脑汁，不惜卖身卖命只图从你身上分一份利益和名誉——此刻他们要走了，或者是静悄悄地，或者是反目为仇地，总之他们走得很坚决，正像他们来得很热烈一样。

撕这样的名片很容易。你保留这些名片其实毫无用处：从来是他们追上门来，用不着你写信；也从来是他们纠缠，而你并无求于他们。你曾经天真地珍惜过，你错以为他们真是同道，你完全没有必要地给这些吸血鬼也留了一点温情。现在他们在患难中撕下了一切面具，跺脚，忿忿地吃了亏一般要走了，而你能够做的，不过是快快撕了他们那些肮脏的名字，并且快快忘掉他们的与吮吸、偷窃

同名的名字。撕这种名片时要忍住恶心；撕时要克服的是真诚的孪生品质：柔软和惊奇。但这并不难，人在锻炼中会突然变得坚决，残酷一般的坚决。转眼间那些撕碎的纸片扔进了垃圾堆，转眼间被强塞入的印象便开始褪色。很快你忘记了他们，忘得像撕过名片后又洗过的手一样。

他们不配被人记忆。经历过这一次，你的大脑也强健了。你忘掉了他们，脑海中凸现出来的，是纯洁得多的群像。

撕名片一事并不是指上述的内容。我说的是另外的人，他们与你的关系反映着大一些的命题。这是第二批；还远不到本质。因此要回忆得平静而简略，原来写散文也有如同写小说那样的烦人过程，我已经感到最核心那一部分给我的压迫，但我非得按部就班。

这是一些与你的历史发生过密切关系的人。可以叫旧日的友人们。从你刚刚步入青春，步入这条很特殊的小道以来，你一面与社会对峙一面结交了各种朋友。

那结交曾是真诚的。有过彻夜的长谈，有过篝火的照耀灼烤。有忘情的欢唱和痛饮。在一些政治式的时期，你们有过一种战友的关系。甚至有过模拟先烈的、多少危险的考验关头。有一些人生的阶段，你们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把逆旅变成了光荣的回忆。

我至今仍然按捺不住惊愕。我不明白究竟是为了什么，那友谊就淡然消褪、而且终于荡然无存了。回忆太鲜烈了，你对他们的怀念太重了，因此痛苦的自责便无从解脱。是不是背离友谊的就是你呢？是不是该被人撕掉忘掉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你一个人呢？为什么只有和你的友谊这样难以保存呢？即使今天，即便此刻，被人不快地、反感地忆起的，难道不是你么？

然而，人们需要友情仅仅是此。至少，我需要支援仅仅在此刻。

以往我为这种个别劲儿，为这种特殊性不安。而今天不同了。

今天我重视自己的特殊性。背靠着“哲合忍耶”——我开始急速地自尊。这是我要求中国文化接受的一个外来语借词，尽管它诞生于中国母体之中。人们向中国输入了那么多外来语，那些都是世界体制的渊藪——盎格鲁·撒克逊的货色；而我输入的是一种烈性的血，是一种义，是一种信，是一种叛逆和坚守的素质。同时，它也是最本质的“友”。

我愿意责备自己以这种“友”的尺度苛求每一个友人。但我别

无选择。极端做为正义的绝望嘶吼时，人无权谴责它。

在与哲合忍耶回民结合战斗的日子里，我敏感地明白了与旧日友人的分歧。友谊若没有信仰为支撑，那友谊确实不是钢。

撕掉这些名片时，心感到了些微的疼痛。若不是在遥远的黄土高原有无数哲合忍耶人民在温暖着我，这疼痛会严重地干扰我。

但是在事实上我们已经分手。或者说，结论是我们已经立场不同。那么，感觉到残生短促的我没有余裕伤感一番了——我静静地撕碎了这些珍存的名片，包括手抄的住址录，然后转过身来。

这场撕，如同一场手术。我也许失去了重要的肉躯的一部分，但我的精神集中了，我感到自己轻装地进入了战斗的状态。

撕碎的名片像雪花一样飞散了，像一场虚构的雪。我觉得怅然，但更觉得干净。那真正的大雪，那启示和神秘的雪，已经在空中密集地酝酿了。

最后是谁轮到呢？我犹豫，我很难写出这种真实。若是没有真正的逆旅，若是没有远托异邦举目无亲，若是没有濒于绝境的切肤体验，我无法写得如此残酷。

在世俗的、日复一日的普通生活中，有一两个人向你伸出了手。以往你一直只是个被娇惯得骄傲的孩子，水淹得快要没顶时，其实你是软弱至极的。这种伸来的手像救命的稻草，你死死地攀住了它。从此没有机会再讲清溺水的缘由，也没有机会再放任自己的本性——所谓恩，偕来的是难言的羞耻。扶助者的高尚与否是另外的事，然而你在感觉施恩者的负担时，就悄悄地开始准备这个告别。比一切更重要的是形象，谁都必须做一个独立的人，承担自己的一切。

在亲切的告别之后，他的名片握在你的掌心。从此应该是天涯互远，从此更要走完全相异的道路。撕到此刻，名片不是纸而是自己胸膛深处的一片带血的心叶。风吹走了它们，也挟带走了对友人的依赖。道路在冬季的寒风中肃穆地伸展着，等着你。

还有女人。爱情是那么不准确的概念，当时那样的热烈，那样的真挚，如今也都冷却了下来。这不是纸印的名片，是人最宝贵的一部分生命。而生命是会衰老的，女人的爱也许也是这样。人无需向自己的内心掩饰的，这一天迟早要来——无论你或她都清楚。

此时不像是用手撕碎一片纸，而像火苗慢慢舐着自己的皮肉。

缓缓的灼痛那么清晰，哀伤在火焰中显得平静，在久久的疼痛后，一切都失去了，只有一些黑烬般的疤痕留在心里。

这样决绝的做法会遭到异议。谁都不会赞同你。只是你的本性，你的灵魂在要求你这样做。丈夫生不能顶天立地，至少不能仰人鼻息、累人不已！决绝是为了烧毁自己的后路，是为了使自己回到原初，决绝之后，纯洁的可能才会再次为你出现。

——你只顾这样想着，把两手的碎片朝天空扬去。它们飞舞如雪片，虚幻的雪从此不会再降下。你赤裸着肉躯，胸前没有一片箔叶护心，走向了坚硬而空旷的大路。

实践了如此的思路以后，使用了这种撕名片的方法以后，我感到了再生。

不仅是哲学术语；如今的再生是真实而亲切的。生存中再没有纠缠的枝蔓杂草，在一场场北中国神奇的大雪中，凸现出来清晰起来的朋友，他、她、他们，都是具有价值的大写的人。抬起腿来，动起手来，我们如今做着的每一件琐碎的小事，如今都与一种不灭的意义相关连。

人也许不应该学习这样的方法。如今的世相和公论都不会赞同我。这是很清楚的，不仅人们不会赞同，而且会反感。

但是，对一些人或一些民族，一些处于关口前的国家，对一种思想来说，这种方法是必须的。大破大立，只有扬弃才能获得真的东西。我大力推销这个撕名片的方法，为的是快快让稀粥沉淀，快快让汤水分离。如果有一天我们有了鲜明对立分庭抗礼、而且都对自家的信念真挚的许许多多的思想和艺术支派，而不是只有一锅人云亦云、察言观色、应时流行的稀粥，那么曙光就出现了，希望就可见了。

3

致先生书

1

当身为后辈，却真切地感到某种把握在沉静中逼近时，那感受是新鲜的。也许确实应当放纵这种瞬间的感受。他身边纠缠着那么多无聊至极的异类，如成群苍蝇在纠缠一具死骸。1991年的我突然觉得应当站出来了，应当有人将心比心，以血拭血。

这原因是由于参照的必要，十余年来我一直寻求参照，但大都以失望告终。我习惯了以血统区别和判断，因为我曾这样认识了自己。托命一支笔以来，我曾非常注意向文人寻找，但结论是否定的。否定之中，又见识过《活动变人形》（王蒙）、《慈航》（诗，昌耀）、《边城》（沈从文）；艾依特玛托夫（苏联）、斯坦贝克（美国）和冈林信康（日本）的各式艺术，以及有一篇仅一页的兼论毛泽东和鲁迅的李志华（李新华？）的小文——因此，我同样不能否认他人的潜力。

这样，对自己的“类”的孤立的自信和无力感，便在每一夜中折磨灵魂。

我坚信，我读着《野草》《故事新编》《药》《伤逝》《故乡》《狂人日记》这几篇时，我相信有了一种把握。我不愿重读。中学生教室里念一遍而如今却日觉鲜烈的印象；也许错，也许对，也许是关于先生上述作品的印象，也许不过是自我感觉——都无关紧要。如果我有能力出版先生一本选集，我只选上述几篇。其中《野草》和《故事新编》只选半部左右——我此刻寄人篱下，身无分文，资料全远在彼岸中国，但是我有如上把握。

就像王蒙依据他作家的内心体验戏作《红楼梦》研究一样，我也只凭自己的内心体验写这篇关于先生的随笔。

曹雪芹固然伟大，但是太中国人味了。或许曹雪芹是满洲人，但满人比汉人更北京化、更市井化、更充溢着孔孟之道的霉味。中